

《儒林外史》的礼及其叙事体结构

〔美〕林顺夫(Lin Shuen-Fu)撰

希春译 维沫校订

维沫按：关于《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林顺夫此文将《儒林外史》的内容与形式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全书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出场次序都是作者精心安排的，体现了作者的世界观和完整的艺术构思。文中不乏独特见解，发前人所未发，颇具参考价值。林顺夫现任美国密执安大学中文系教授，此文是他1974年在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叙事体文学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研究论文，收入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德鲁H.普莱克斯（汉名蒲安迪）编辑的《中国叙事体文学评论集》一书（1977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全文译成中文共有一万六千字，今节去考证小说故事发生时间及解释儒家礼仪的部分内容。

在二十世纪，许多读者认为《儒林外史》在结构上是极不完整的。他们往往把这部十八世纪的讽刺文学，看成缺乏完整构思的连环短篇故事。这种看法是由于不理解《儒林外史》独有的内部统一的构思，而对集中的统一的情节结构（这是西方小说典型结构）的一种偏爱。

据我了解，从晚清到民国初年还没有发现对《儒林外史》的结构加以指责的舆论，而以后许多中国作家的这种批评是由于逐渐受到西方文学思想影响的结果。

从一个不知姓名的作者的笔记中摘录下来的用浅显的古汉语写出的这段话，也许是对这部小说结构发表的最早批评意见：“《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之无端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何以明其然也，将谓其以人为干耶，则杜少卿一人，不能结束全书人物；将谓其以事为干耶，则势利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书事情。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

这段话想说明，吴敬梓(1701—1754)在开始写作前对自己的小说就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由于人物和事件——这两个构成小说的基本因素，据说应该按连贯的和灵活的次序加以安排，因此，这位不知名的作者又进一步指出：在《儒林外史》中人物和事件都被孤立开来，没有形成统一的因素。以上两段话都收集在1918年秋天蒋瑞藻编辑的《小说考证·拾遗》中。蒋瑞藻的书是一本关于从晚清到民国时期戏剧和小说的内容提要 and 评论选集。

除以上两段论述外，还有一些内容我没有引证，如作者将《儒林外史》说成是一本白话体小说中最好的范本；他认为这种白话体是从地方土语、政府官话或者古汉语中解放出来的，他把在《儒林外史》中发现的这种白话文推荐为文学创作中的一种适中语言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从这种观点中，可以推论出这位不知名作家的话，大约是在1917年文学革命中写的。因为当时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正提倡按照西方的理论，用白话文创作新的现实主义的文学。这位不知名的作家，也许正是受到西方小说的某些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发表上述观点的。

这种对《儒林外史》的结构所表示的异义，还可反映出文学革命期间新知识分子对传统的中国文学所普遍持有的批判态度。如果注意到文学革命中几位主要人物，对这位不知名的作者的观点那样赞同的事实，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恰恰是受到西方思想同化的代表者。

例如文学革命中的著名人物胡适(1891—1962),用明显的、类似的措辞多次阐述了他对《儒林外史》的批评的观点,指出《儒林外史》对晚清讽刺小说巨大的不良影响。他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写道:“《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书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儒林外史》所以成为晚清小说的典范,所以受到推崇,仅仅是由于它的体裁简单而又容易掌握罢了。用这种体裁,作家可以不必考虑结构架子,只要从一个插话闲扯到另一个插话就成了。

胡适在以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更清楚地显露出西方出版物观点的痕迹。他在论文中讨论了晚清小说家吴沃尧(吴趼人,1867—1910,译注)的著作。胡适认为吴沃尧所以超过同时代的作家,原因就在于他的全部作品都有架子结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胡适指出,虽然吴沃尧所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是由许许多多的短故事所组成的,但它有一个结构中心,全部用“我”做为主要人物,以“我”的经历作为结构的轮廓。吴沃尧所以有能力这样做,正是因为他受西方小说某种程度的影响。

其实胡适的这些见解,早在1917年5月(当时胡适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写博士论文)写给陈独秀的一封公开信中,已经表现出来了。当时陈独秀是《新青年》的主编。这封信是针对钱玄同在一封

信里谈到了胡适著名的论文——《文学改良刍议》——而写的。钱信和胡信都包含了对几部传统中国小说的简略的探讨，而胡适仅仅评价了这些著作的体裁。胡适很注意小说的形式问题，虽然他对《儒林外史》结构的最初分析中并没有提及西方小说，但是他把西方小说当作典范的倾向是能看得出来的。通过研究胡适思想的演变过程，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胡适反对《儒林外史》的偏见，其根源正是由于西方思想的框框和西方小说完整的情节结构的影响。

事实上，胡适不仅对《儒林外史》有偏见，而且对全部中国传统小说都有偏见。正如前面提到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写的：“所以这一千年的小说里，差不多都是没有布局的，内中比较出色的，如《金瓶梅》，如《红楼梦》，虽然拿一家的历史做布局，不致十分散漫，但结构仍旧是很松的；今年偷一个潘五儿，明年偷一个王六儿；这里开一个菊花诗社，那里开一个秋海棠诗社；今回老太太做生日，下回薛姑娘做生日，……翻来覆去，实在有点讨厌。《怪现状》想用《红楼梦》的间架来支配《官场现形记》的材料，故那个主人“我”跑来跑去，到南京就见着听着南京的故事，到上海便见着听着上海的许多故事，到广东便见着听着广东的许多故事。其实这都是很松的组织，很勉强的支配，很不自然的布局。《九命奇冤》便不同了。他用中国讽刺小说的技术来写家庭与官场，用中国北方强盗的技术来写强盗与强盗的军师，但他又用西洋侦探小说的布局来做一个总结构。繁文一概削尽，枝叶一齐扫光，只剩下这一个人命案的起落因果做一个中心题目。有了这个统一的结构，又没有勉强的穿插，故看的人的兴趣自然能自始至终不致厌倦。故《九命奇冤》在技术一方面要算最完备的一部小说了。”

这的确是一段令人吃惊的文字，也是一段很说明问题的文字。它充分地说明胡适对晚清小说传统结构发生变化的观点是受西方

影响而得出来的。胡适在《九命奇冤》发现谋杀案构成这本小说的情节，而这种情节的确与西方侦探小说的情节结构相似。他本来非常了解传统小说与西方小说结构之间的区别，然而胡适只是把西方小说当作典范，并根据这点得出结论，说中国传统小说缺少一个完整的骨架，却没有看到中国小说结构上的特性。胡适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在现代文学上的成就，但他不欣赏中国传统小说在结构上独有的真正价值。这说明片面挑剔中国文化毛病的一种偏见，而这种偏见是中国“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甚至象《中国小说史略》这本权威著作的作者鲁迅（1881——1936）也说过：“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他们认为天生就有一种含蓄地或明确地反映着西方出版物的典型观点存在。但这些观点忽略了在《儒林外史》中发现的那样特殊的结构典型。为了理解《儒林外史》这种特殊的结构模式，我们必须首先从二十世纪早期受到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影响很深的中国学者们的这些基本观点中解放出来。我在这篇探讨性的文章中，希望能说明吴敬梓作品的条理性和完整性，决不比非常出色的西方小说作者逊色。吴敬梓把“礼”的原理作为贯穿他的小说整个情节的原则，我将在下面的内容中对这点加以阐述。

这里，首先要注意的事，是中国小说的历史。因为胡适暗示了《儒林外史》不是一部唯一没有完整情节结构的小说。确实，全部中国传统小说都具有一种不完整的插话式的情节特点。这种现象是与宋元时期说书人说书时的传统方式有关，也与早期中国小说的传统习惯有关。一般说来，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然而，这种理论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此外，这种插话的性质在其它文学的作品中也是常见的。例如历史小说、传记、传奇及白话短篇小说。因此，我们应该把这种结构特点，看作中国传统小说的特征。

我们所谈到的这种插话方式的起源，也与传统的中国世界观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易经》这部书里就有所反映。几位现代的权威人士已注意到这种世界观的特性是与其它世界观大不相同的，人们可以在弗里德里克 W. 莫特 (Frederick W. Mote) 所著的《中国与西方宇宙哲学的鸿沟》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基础》中，看到关于中国世界观的含蓄而简明的论述。中国人不象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人那样，把宇宙和人的生成看作是由外力创造的，而是有着自己特殊的信仰。中国人把宇宙看作一种自持的、自生的、力学的过程，宇宙中的各部分都在一个和谐的、有机的整体里相互起作用。而人，被看成参与宇宙创造过程中的一个有机部分。这样，形成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哲学观点。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一个未经外力创造的宇宙的独特观念，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与我们探讨中国小说结构特色的另一个紧密相关的问题，就是中国人传统的世界观与中国社会上各种事务性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按照西方思想的特点，应该要求各种事件一个接一个很机械地包含在一条因果关系的链子里。当这种因果观念被人们接受以后，用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就形成紧密的集中的情节结构。在这种直线和习惯的结构类型中，不是人物因素，就是事件的因素被单独抽出来，成为小说中贯穿各种因素的动力或主要动力。然而，传统的中国观点与这种对因果关系的解释根本不同。他们把因果关系看作是形成一个庞大的、杂乱的网状的关系或过程，而不是把各种事件安排在直线的因果关系之中。事件不是按因果关系安排，而是并排的或者并列的被组织在一起，好象是同时发生似的。这样，这种因果关系的世俗关系就成为并列的具体“事件”的动力模式。

在这种“同期的”概念中，不可能把一个特殊的成分当成主要

动力，因为所有其它的成份在理论上都具有同样的可能性去影响整个观点的形成。在讨论这种中国宇宙观的特点时，约塞夫·尼达哈姆说：“宇宙本身是一个庞大的有机体。一会儿这个做为主导，一会儿另一个做为主导。宇宙是自生的，而不是被创造出来的。它的所有部分都在相互帮助之下进行合作，这种合作是完全自由的。较大的或者较小的部分都根据自己的大小起自己的作用。既不抢先，也不落后。”在这种宇宙观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小说的作者很少选择一个人物或者一桩事件当做小说里统一的因素。通常的作法是在一本书里，一会儿以这个人物为主，一会儿又以另一个人物为主；或者一会儿以这桩事件为主，一会儿又以另一桩事件为主。传统的中国小说很少集中描写一个人物的发展，或者集中叙述一个社会现象的过程，而是交待广大凡人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这与其说是固定中心，不如说是可移动的中心。这种艺术倾向在中国山水画中也同样能够发现。在中国山水画中，根本没有单一的透视画法。在小说和山水画中，毫无疑问，都具有中国宇宙观的含义。《儒林外史》正是这样，它的每一章节中都集中描写一两个主要人物和几个次要人物，构成一幅特定的社会景象。但是这些主要人物或次要人物在下一章节里就退居主要情节以外，或者从情景中消失了，只有当读者看完整部小说以后，才能获得对《儒林外史》的总的轮廓。此外，人物出现、消失、又出现，几乎极为随便，好象完全被偶然的会所支配，并且是同时发生的。这些现象甚至在古代神话或白话短篇小说中也能常常见到。纵然在这些东西里只有一个中心人物，但故事仍然包括一系列象创造出来的、奇迹般的事件。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经常运用“适”或“会”、“适遇”、“正值”、“却待”和“无巧不成书”等术语，作为联接各个事件的写作手法，很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这种结构的模式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小说的模式，不能说它是缺少对通盘计划

的考虑。

毫无疑问，中国人对 C. G. JUNG “没有因果关系的人类经验”的论述会给予更多的重视。然而，我们不要错认为古代中国人一定也没有因果关系的概念。某一行为或事件的“因果”，只不过被说成是自发地连结在一起罢了。在古代神话里的奇迹般的事件和白话短篇中的故事，正不乏这种自发的偶然事件。传统的中国小说的一章转到另一章的表现手法，是体现这种因果关系的另一个完善的例子。《儒林外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的每一章回（除了楔子与结尾）都包括一件有趣的偶然发生的事件，它与下一章回的另一事件沟通了关系。每一个偶然事件的收场前总有如下的公式话：“只因这一番，有分教”。接着这句公式话，就是一首概述下一章回将要发生的事件的诗句。很清楚，在每一章回的收场时都设计了一个悬念，这种写作技巧无疑是从说书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但是，它做为事件的解释对读者所做的暗示是不能忽视的。我们可能反对这种繁琐的连结方式，然而它对我们了解古代的中国哲理思想却是不无关系的。

我希望我现在的论点讲清楚了，即对于被看作一系列结构松散的短篇故事集的《儒林外史》的评价，是处在两种不同的基本思想方法和解释事件的方法之间冲突的焦点上。我的论点是小说的结构，不仅是一种适当的文学技巧——这是相当重要的，而且也是一种人们看待生活事件的方法。

我们再看看孔夫子的礼教观（这种礼教观支配了《儒林外史》的道德观），和小说相对的统一结构之间的关系。当传统的中国方式和思想方法受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彻底挑战的关键时刻（提醒读者注意：“礼教”在当时是象吴虞和胡适这样的激进作家严厉抨击的目标之一），并没有发生对《儒林外史》结构进行一场具体的围攻，这一点是很明白的。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对《儒林外史》的批

评仅来自胡适，他是当时一位代表人物。胡适相信“全盘西化”是对中国如何现代化问题的回答。但是，传统的批评家，例如金圣叹（1610—1661）、张竹坡、毛宗岗和卧闲草堂（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初期），他们没有在西方文化的全面影响下，没有面临改革中国传统观念的问题，并且他们的美学判断也不受西方标准的影响，因此全都能够欣赏中国古典小说。胡适所说的已很清楚，我们就不必为这个问题再加以辩论了。我们对中国传统小说的特性，要加以认识并且客观地阐述。

……这部小说结构的顶点是对“泰伯”尊敬的仪式，书中一切理想化的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忠实于泰伯，正说明这种梦想的重要意义。

泰伯，这个传说中的周朝祖先的长子将皇位让给他的弟弟，并且跑到吴国和越国，将文明带给了“野蛮”人。这种为了向这位古代贤人表示敬意而修建庙宇、举行象征性仪式的动机，在迟衡山的一段话中表现出来：“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却并不曾有个专祠。那文昌殿、关帝庙，到处都有。小弟意思要约些朋友，各捐几何，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

这些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希望用举行仪式的行动来恢复礼仪的教育。但是他们的希望因受到明朝科举的影响而落空了。结果，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梦想被这种科举考试制度所腐蚀。这种制度鼓励那些熟读八股文章只追求富贵功名的人。在这部小说里甚至嘉靖皇帝也被说成很重视礼仪问题的人。当他召见庄徵君时，对这位隐士说：“朕在位三十五年，幸托天地祖宗，海宇升平，边疆无事。只是百姓未尽温饱，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这教养之事，何者为先？所以特将先生起自田间；望先生悉心为朕筹画，不必有所隐讳。”

但是，正如小说所描写的那样，世界是如此腐败，如此颓废，以至于嘉靖皇帝和这些优秀知识分子的努力势必失败。在泰伯祠举行的仪式一结束，跟着就出现了企图欺骗杜少卿的江湖骗子、剑客铁臂张。向泰伯祠祭祀以后，作者马上介绍了非礼的情况，用来批评几次非礼和庸俗的行为。在三十三回——三十七回里所反映的非礼情况是与关心礼乐根本对立的。在小说结尾时，这座泰伯祠已经倒塌，成为后世文人思想中重新寻求的东西。对泰伯表示尊敬所演出的和谐而神圣的礼仪（一个社会是应该有这样的礼仪），竟被爱嘲笑的和思想狭隘的世人看作获得名誉的一种欺骗手段。归根到底，一个真正懂礼仪的世人所能够做的唯一事情，只能成为一个象王冕那样的隐居艺术家。

现在回到小说的结构问题上来。我们必然要问：礼仪因素（本书道德观念的核心）是如何当作主题的？礼仪在《儒林外史》中，基本上有两个结构功能：第一，它将一连串分散的插曲构成一个较大的集中的部分；第二，它又将这些较大的部分，组成一部优秀的完整的书。显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特性。因此，吴敬梓用礼仪（实质上是一种公开的仪式表现）当作主题是非常合适的。

第一回与楔子完成了一种特殊的任务。它阐明了本书的主题，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包含本书主要轮廓的虚构的故事。这个虚构的故事是作为知识分子楷模的王冕传。他的正直和修养是用来衡量其它每一个人物的准绳。在这篇传里，王冕的礼仪化的行为被仔细地记载下来。他被刻划成一个理想的儒家世人，一位学问渊博、道德高尚、多才多艺的正人君子。事实上，书中没有其它人物能与王冕相提并论。然而，吴敬梓也提供了另外两个传统性的短篇故事，描写了几个人，那就是三十六回的虞博士和结尾的四个不同类型的艺人。他们做为楷模人物的形象以便与楔子所提出的理想一致起来。王冕的礼仪化的行为被当作反对危素、翟买办和

时知县之类“富贵”、“功名”迷的镜子。对一个夏日雨后七泖湖景色的描写尤其意味深长。王冕被自然界的美所触动，决心要成为一个画家；三个不知名的贡生一边野餐一边谈论着名誉与财富。卧闲草堂说的对：这三个不知名的贡生，是这本书中绝大部分贡生的影子。在小说的第一部分里，把三群知识分子聚合到一起来的三起重要事件都是在湖边发生的。没有理由怀疑吴敬梓是自觉地这样做的，他这样做正是为了创造内部的平衡和一致性。此外，作为本书楔子的关于王冕的这个虚构的故事，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这本书主要故事结构的轮廓。吴敬梓在小说里，继承了长期来说书人的说话传统，而这种传统把楔子当作一种基本的结构设计来使用。

第一部分(第二回至三十回)集中讽刺了两类知识分子。第一类知识分子企图通过科举考试制度以求富贵功名；第二类知识分子完全拒绝这种考试制度，而赞成隐居生活。第一类知识分子熟读八股文，而轻视坚持被他们称为“杂览”的诗词的第二类知识分子。反之，第二类知识分子把隐居诗人看作自己的理想，而轻视第一类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俗气。尽管他们的信念和生活方式有分歧，但这两类知识分子同样都追求财富和名誉。

在第一部分里，三个事件中的第一件事是在第十二回中出现的。这一回里在莺脰湖上组织了一次出游，这次出游将八位“名士”弄到一起来了。他们都自称为隐士。这次出游总的情调是“风雅”和“古怪”。第二个主要事件表现在第十八回里。这个事件是在四位“名士”和四位“考查范文”的选家在西湖上举行“诗会”时发生的。所有参与者，包括以前从未学过诗词的匡超人，在诗会正式仪式完结后都做起诗来。由于作者对第一件事持否定态度，关于出游西湖本身就不再叙述了。而关于这个诗会，其显著的调子似乎是卖弄“学问”和缺少真正的修养。第三个重要事件出于第三

十回。在这一回里，杜慎卿（杜少卿的堂兄）在莫愁湖上为梨园子弟组织了一次比赛。九位知识分子，一位和尚，一位道士和戏班教习鲍廷玺应邀观赏了这个豪华的场面。虽然这九位知识分子也是吴敬梓的讽刺目标，但是他们都被当作具有风雅和高尚风格的不落俗套的人物来描写。他们中有几位是有资格参加在泰伯祠举行礼仪大典的人物。在梨园子弟比赛中达到高峰的几个插曲，把第一部分描写过的知识分子及少数伪知识分子的内容转化到第二部分。第二部分集中于更为不寻常的优秀的知识分子身上。这些插曲增加了雅韵的调子，为泰伯祠的大典准备了必要的气氛。这三个事件中每一件事都是以在知识分子中举行仪式的行动来使他们友好取乐，尤其是借以获得名誉。在本书第一部分中描写的这种文人聚会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社交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应用文人聚会当做一种结构设计（象我们在《儒林外史》中看到的那样），正如张心沧在解释“宴会式小说”时所论述的，那就是《水浒传》中曾经运用的宴会形式。在《水浒传》中，“宴会”被当作一种有效的方法来集合分散在全国的一百零八个英雄。这种方法在其它几本中国传统小说中也表现出来。

当《儒林外史》进入第二部分（第三十一回——三十七回）时，调子从讽刺转到现实中来。事实上这种转变在前几回已露端倪。整个第二部分集中在为到泰伯祠祭祀的完善的准备工作中。当然，先前每一个公开事件都有一个特殊的主要的侧重点，如第二和第三事件中包括了更多参与事件的各种各样的人。在泰伯祠的礼仪大典中牵扯进去许多人，集合了二十四位知识分子、十六个乐师和二十六个表演礼仪舞蹈童子，总共七十六人。这些人在那位贤德的虞博士的领导下，都融合在一个和谐的礼乐仪式中。现在这二十四位知识分子对读者来说已经很熟悉了，因为他们在前几回中都出现过，并且他们中有些人也参加了前三个重要事件。这时，

四个事件连结了四个对等单位的人物，他们一次比一次前进，每一次事件参与的人都比前一次的多，直到泰伯祠大典达到了高潮。

然而美好的梦想维持不了多久，一旦神圣的礼仪结束，它也就在人们的记忆中很快地消失了。泰伯祠的祭祀对社会没有带来象几位领导人物所希望的积极效果。于是，第三部分又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零碎的五花八门的故事。虽然有许许多多各个人的礼仪和仪式，但是没有一个象我们前面叙述的四个事件那样完整。本书最后部分叙述的重点从知识分子的范畴转到社会的广泛阶层。尽管几个杰出的知识分子在这些情景中也出现，但是他们显然不再是重要的中心人物。这部分所表现的是一些反对腐化堕落、庸俗下流行为的非凡的单独人物。这些非凡人物不象他们以怀念的心情所回顾的那些作为典范的优秀知识分子那样，而是有能力把礼仪所规定的道德变成具体行动，虽然他们的行动往往是粗俗的和生硬的。

第三部分，从内容上看，显得零乱冗长，但这决不是作者创作才能的衰退，刚好相反，作者设计这种冗长的描写是在暗示本书的中心人物所珍爱的完善道德理想的彻底失败。因此，我们也许可以把整个第三部分看作与泰伯祠神圣礼仪是一致的整体。以泰伯祠祭祀作为分界线，能够看出由两个方面组成的《儒林外史》的三个重要部分。当我们想到以庄重仪式为分界的两大部分之间的几个重要因素完全一致的时候，这点就更为明显了。本书前半部是以记载两位老秀才中举(标志着踏上了富贵的阶梯)开始的。它包括几个结婚仪式——结婚仪式暗示新生活的开始。在第二回的开头还介绍了梅玖和王惠的预示他们共享富贵的梦。我们也看到秀才们为了他们的名利向算命先生求问的事件。相反的，本书后半部，从第三十七回礼乐大典以后开始，我们看到葬礼，为虞博士送行的集会、节孝入祠、参观泰伯祠遗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预示

了本书的结尾。接近第三部分末尾时，前面的四个重要事件在两个次要人物陈思阮（算命先生陈和甫的儿子，陈和甫在本书开头几回出现过）和丁言志模糊的记忆中再现，并且成为他们争论的题目。在五十三回和五十四回中，算命和做梦又回到故事中来了，名妓聘娘做了一个自己将成为一个尼姑的梦，她求教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算出这将成为事实。第一部分两个老秀才中举升迁后名利双得与中举前的穷极潦倒形成明显的对比。第三部分的结尾呆名士丁言志向聘娘献诗，聘娘由于虔婆要丁言志留下花钱而与虔婆大吵大闹以后就剃光了头，出家去了，正如她的梦和算命先生所预卜的一样。吴敬梓把本书的主要三个部分放进算命和做梦的范围内加以描写，有力地说明了富贵功名的虚伪性。总的来说，《儒林外史》揭露了升迁下降的节奏。两大部分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更增强了故事本身的统一和完整。

最后，我们来看看本书的结尾吧。在结尾中介绍了四位理想化了的奇怪的艺术家的形象，这些形象立即使我们回想起本书开头的王冕的小传。本书是否有一个圆满的收场呢？虽然这四位奇人也是理想化了的人物，也是隐居的艺术家，但他们都够不上王冕的优雅与修养，甚至也够不上第二部分中名士的优雅和修养。王冕拥有中国古典文学整个领域的渊博知识，而四个奇人中每一个人仅掌握文人们四种传统的闲暇艺术——琴、棋、书、画中的一种。这四个奇人固执而狭隘的性格，确实被塑造得更接近在本书后半部出现的不同寻常的人物。毫无疑问，他们是被庸俗的下层社会逼得行为怪癖。

肯定地说，人物性格的一致性，在本书第一和第二部分前半部中间是确实存在的。这种一致性建立起这部小说作为一个整体的内部的和谐。然而，隐居艺术家的再现和理想化人物小传的写法不仅仅是一种结构设计，这部小说毕竟是被它的作者当作一种

包括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来写的。《儒林外史》可以看成是吴敬梓对衰退了的传统中国社会的一种广泛的完整的幻想，也是他对一种悠久历史进程的叙述，这两点并不是平衡的。结尾以前的五十四回以如下的诗句而结束：

风流云散，贤豪才色总成空；
薪尽火传，工匠市廛都有韵。

一个世纪已经结束的感觉都在这两句诗里简要的表达出来了。这种感觉在最后一回的开头就明显表现出来，并且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是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所以那些大户人家，冠、昏、丧、祭，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的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贫贱儒生，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那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

与介绍小说的开场那一段文字相一致（开场诗的下边，这段文字说明了这部小说的主题），我们可以将以上这段文字当作全书的总结。它的确表现了由科举出身的官员所统治的世界一幅非常灰暗的图画。现在礼的教训早已消失了，而那些被当作礼的支持者的由科举出身的官员们只是无耻地追求名利。因此，这部小说是由裁缝荆元的琴以极为庄严而悲哀的调子结束。

然而，如夏志清所观察的那样，本书结尾有一种乐观的暗示，它与开场的悲观论调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结尾表达了中国人的见解——“礼失而求诸野”，从粗俗的市井小民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有能力表示修养（韵或优雅），尤其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都按

照礼仪行事，因此能把礼教继续开展下去。即使礼仪世界的孔子思想是吴敬梓的讽刺目标，但它仍然是他所处的这个社会上有价值的道德准绳。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儒林外史》的结构反映了中国人的“前期的”世界观，它统治了传统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吴敬梓生活在清朝最强盛和最繁荣时期，生活在中国人在外国侵略的猛烈进攻和西方压力的影响下开始对他们的文化失去信心以前的时期。因此，他决不能象“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所做的那样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进行挑战。假如吴敬梓感觉到在他这个时代中国文化衰退的话，他就能看到那种不可替代的礼仪化世界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1981.6.译 1981.10.校订）

《十三经注疏》的卷数和字数

《十三经注疏》是研究我国先秦文化的重要文献。据清人钱泰吉统计，经文本身除去篇名，共有647500多字。全书共416卷，其中有：

- 《周易正义》10卷，经文24270字；
- 《尚书正义》20卷，经文25800字；
- 《毛诗正义》70卷，经文39224字；
- 《周礼注疏》42卷，经文45806字；
- 《仪礼注疏》50卷，经文57111字；
- 《礼记正义》63卷，经文99020字；
- 《春秋左传正义》60卷，经文196845字；
- 《春秋公羊传注疏》28卷，经文44748字；
- 《春秋谷梁传注疏》20卷，经文42089字；
- 《论语注疏》20卷，经文12700字；
- 《孝经注疏》9卷，经文1903字；
- 《尔雅注疏》10卷，经文10791字。
- 《孟子注疏》14卷，经文34685字。

《十三经注疏》，1957年8月曾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四十册。最近又据世界书局本重印。

· 王思保 ·